

《東華漢學》第 30 期；165-20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9 年 12 月

永嘉學派與《春秋》世變 ——以陳傅良《春秋後傳》為例*

康凱淋**

【摘要】

本文以陳傅良《春秋後傳》為例，分析永嘉學派和《春秋》世變的論題，包含永嘉學派《春秋》學的內容、特色，以及與其他學派的互動關係。誠如學界觀察，陳傅良將《春秋》世變作為《春秋》大義的重要基石與唯一指引，目光建構在王道存滅和伯統盛衰的脈絡，循此詮解經文書法，自覺地將「世變」織聯到各個語言現象，歸諸於麟經涵藏之深義。而朱熹反對浙學有關《春秋》、《左傳》伯業盛衰的討論，一方面認為他們切入經、史典籍的方法失當，更指出內在理路流於博雜而不能返約的弊病。陳傅良融貫「世變／伯業」於《春秋後傳》並非單純地形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南宋永嘉學派《春秋》學研究」（計畫編號：106-2410-H-030-084-）之研究成果，特此致謝。初稿曾宣讀於「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IV」學術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7.10），承蒙張曉生教授審閱指正；論文投稿期間，匿名審查委員亦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使本文論述更加完備，謹申謝忱。

**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式答辯，背後目的是主動對抗朱學帶來的批評，是書寓有捍衛自身價值的堅定，以及延續學術命脈的決心。

關鍵詞：陳傅良、永嘉學派、《春秋》、《左傳》、朱熹

一、前言

浙東學派在南宋學術佔有一席之地，不論是崛起勢力或思想主張都對當時學術發展有深切的影響。按照學界普遍的說法，浙東學派包含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他們與朱學、陸學共同活躍於「浙東」地區，相互對話、刺激與抗衡。其中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有薛季宣、陳傅良、葉適、戴溪，他們分別為此學派的學術宗旨定下基調，以及擴其規模，整合思想體系而集大成。

學界陸續有不少論著探討永嘉學派的學術思想，或針對永嘉幾位大儒像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甚至是上推永嘉學派的啟蒙者王開祖、元豐九先生、鄭伯熊等輩專論其說，各方面研究皆已取得豐碩的成績。¹然而陸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意識到當前永嘉學術思想研究的失衡，其中最大的問題是：「在永嘉學派的研究中，抽取出思想者『事功』

¹ 目前關於永嘉學派整體研究較為詳盡的專書有三：陳安金、王宇《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崛起研究》、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陸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王宇集中在永嘉學者與浙東其他學派、朱學、陸學的互動情形，呈現溫州的政治、經濟、科舉、軍事等區域文化，主題涵蓋甚廣，而且述及許多人物，有助於我們掌握永嘉學派的傳播活動，以及和當代學術思潮的對應。陸敏珍有意釐清永嘉學派自身的學術思想轉變，但寫作偏重思想者的人物形象、身分歸屬與內心世界。至於其他著作的研究概況，陳安金〈從對立到整合：永嘉學派研究的基本路向〉大致歸納幾個方向：作為理學對立面的永嘉學派、將永嘉學派整合到儒家道統的努力、葉適與理學關係的研究、對永嘉學派外部條件的研究等，表達學界研究取得一定的成績，而這些成果有助後人理解永嘉學派的興起、流衍，與整個學術社群的關聯。見陳安金、王宇，《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崛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 1-353。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頁 1-487。陸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頁 1-332。陳安金，〈從對立到整合：永嘉學派研究的基本路向〉，《哲學動態》第 5 期（2004），頁 45-49。

的一面，詳加發揮，成為絕大多數學者的預設。……事功特徵的預設也讓研究者忽視了永嘉學者及其時人對他們思想的定位。」²也就是說，永嘉學派的事功思想最受各家注意，但無形間也壓縮或忽略了相關的研究空間，比方像永嘉學派的《春秋》學，甚至是其他經學論著的思想主題。

葉適（1150-1223）曰：「永嘉之學，必彌綸以通世變者，薛經其始而陳緯其終也。」³元儒黃潛（1277-1357）亦言：「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為說。」⁴永嘉學派以「世變」作為知識形態的建構途徑，具體落實在《春秋》經解，最早在薛季宣就有此特色，⁵而且影響了陳傅良的治經方法。樓鑰（1137-1213）就曾概括陳傅良的解經主軸：「深究經旨，詳閱世變。」⁶其次，葉適《習學記言序目》也說道：「《春秋》因諸侯之史，錄世變，述霸政，續《詩》《書》之統緒，使東周有所系而未失。」⁷提到「世變」與「霸政」的觀點，並批評「《左氏》但紀事實，不論世變，固失之矣。」⁸對於《春秋》襄公二十七年宋之盟也感嘆：「人紀壞，道統滅，皆始于宋之盟，自是以來，號為治世，不過弭兵而已，此又世變之大者。」⁹戴溪經解提到世變的地方也不少，《春秋》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春秋講義》曰：「及楚靈之始立也，偃然欲為桓文之事、會中國之諸侯、執中國之君、伐人之國、滅人之邑、為中國討罪而執其叛臣，此其用意不淺

² 陸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頁 13-14。

³ 宋·葉適，《水心文集》，載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卷 10，〈溫州新修學記〉，頁 178。

⁴ 元·黃潛，《黃文獻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本），卷 5，〈送曹順甫序〉，頁 196。

⁵ 黃覺弘曾羅列薛季宣《春秋》佚說中「通世變」之經例，可參考。見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257。

⁶ 宋·樓鑰，《攻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本），卷 51，〈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序〉，頁 699。

⁷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9，頁 119。

⁸ 同前註，頁 125。

⁹ 同前註。

也。晉人恬然若不聞者，亦可以觀世變之盛衰矣。」¹⁰從晉、楚互動看夷、夏之世變。

元末明初婺州學者王禕（1321-1372）特別高舉陳傅良的學術成就與其對永嘉學派的貢獻：「自薛氏一再傳為陳君舉氏、葉正則氏、戴少望氏，而陳氏尤精密。討論經史，貫穿百氏，年經月緯，晝驗夜索，一事一物咸稽於極，上下千載珠貫而絲組之，綜理當世之務於治道，可以興滯而補弊，復古而至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此所以永嘉經制之學，要在彌綸以通世變，操術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封植深固，足以自名其家也。」¹¹若據蔡幼學（1154-1217）所記，有關陳傅良《春秋》學的著作有《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兩部，¹²但《左氏章旨》已佚，僅存《春秋後傳》可得，後人尚能從中掌握陳傅良《春秋》學的梗概。

目前學界多已看出陳傅良《春秋》學與「通世變」的關係，例如黃覺弘說：「陳傅良不僅繼承薛季宣『通世變』精神，更是將『通世變』作為至關重要的《春秋》大義。」¹³趙伯雄認為陳傅良「主張對《春秋》所歷二百四十二年做歷史的考察，根據『世變』來理解經義。」¹⁴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亦指出：「陳氏治經，又反對一些經學家以例言《春秋》的陋習，而主張根據『世變』來理解經義。……正是著眼於歷史發展的大勢，正是欲以史眼來探《春秋》經義。」¹⁵因此我們若要分析永嘉學派和《春秋》世變的論題，可以聚焦在陳傅良《春

¹⁰ 宋·戴溪，《春秋講義》（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8，《叢書集成續編》本），卷4上，頁168。

¹¹ 王禕，《王忠文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本），卷3，〈送顧仲明序〉，頁61-62。

¹² 宋·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載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附錄二，頁697。

¹³ 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頁260。

¹⁴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546。

¹⁵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頁57-58。

秋後傳》一書，體察永嘉學派《春秋》學的特色，進而釐清永嘉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幾何交集，勾勒清楚的輻輳與聚散。

二、伯業更迭：陳傅良「《春秋》世變」的比事推演

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說：「在史學史上，敘事一般都不是單純的『就事論事』，而具有一定的解釋功能。因為任何歷史敘事都不僅限於陳述事實，對史事的選擇本身就帶有解釋的意向，何況敘述一般都包含著敘述者對事實之間的聯繫及其意義的判斷，特別是對因果關聯的說明。」¹⁶如果歷史敘事本身就是一種歷史解釋，那麼孔子《春秋》筆削魯《春秋》就是透過整理國史冊文，藉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史記」表達他的意義判斷，甚至帶有批評精神，¹⁷陳傅良《春秋後傳》亦是如此。

借取元代程端學（1278-1334）所言：「夫《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¹⁸陳傅良通貫經文的前後本末、上下終始，採取屬辭比事以綴輯春秋世變的歷史敘述。在大的比事框架中，可以橫跨百年來的時間變遷，例如：

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卷1，頁12124）

書齊、鄭盟於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於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卷1，頁12126）

¹⁶ 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頁315。

¹⁷ 戴景賢說：「自有孔子之筆、削，其性質始由原初意義之『史記』，轉而成為帶有『批評精神』（critical spirit）之『纂史之學』。」見戴景賢，〈論宋代經史學發展之類型、樣態、取徑、議題與其所形成之特殊之文獻之學〉，《文與哲》第28期（2016.6），頁87。

¹⁸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春秋本義通論〉，頁34。

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終始也。（卷11，頁12213）

以隱公至定哀的會盟，或是隱公到定公的淪平，判斷為《春秋》始末之起訖，確實能將參伍懸遠、散濇橫梗的事迹彼此統繫，¹⁹而目光集中於諸侯聚散正亦應合樓鑰概括《後傳》的歷史敘述：

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²⁰

《後傳》主要勾勒從春秋之初，諸侯始不尊周王，淪為伯者相競；再到春秋之末，中國諸侯久無伯者，形成蠻夷爭勢的局面，並提舉「無王」至「無伯」的歷史解釋：「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卷12，頁12216）揭示這些國家對春秋世變的影響，而其中的始作俑者就是鄭莊公。《後傳》曰：「宋、魯、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公會齊、鄭于中丘而後諸侯之師衡行於天下，罪莫甚於鄭莊。」（卷1，頁12128）陳傅良最不滿鄭莊公，謂「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卷8，頁12183），直指「東周之不競，鄭莊公為之也」（卷2，頁12133），糾舉他對中國造成的傷害。所以像《春秋》隱公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陳傅良發義：「墮天子之令於是始也。……鄭有志於叛王而合諸侯，故無王命而私會齊、魯，齊、魯亦無王命而私會於鄭，而後諸侯之師始衡行於天下。」（卷1，頁12128）此年中丘之會既已呈顯志在叛王的私意，也能端見周室綱紀解紐、揆柄下移之肇始，因此「夫子之作《春秋》於隱桓莊之際，唯鄭多特筆焉」（卷1，頁12126），既已突顯

¹⁹ 張高評定義屬辭比事曾提到：「史事之有漸無頓，良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辭文之散濇橫梗者，宜統合連屬之；載事之參伍懸遠者，當比次類及之。」見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44。

²⁰ 宋·樓鑰，《攻媿集》，卷51，〈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序〉，頁699。

鄭莊公在春秋「無王」世變歷程的關鍵，又能回歸聖人《春秋》的筆法寓意。

至於小的比事架構，陳傅良指導賈端老治學時曾強調：「《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²¹大抵將《春秋》分為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三大階段，每個階段主要是開陳霸統之興衰，圍繞鄭莊、齊桓、晉文、晉靈、晉悼、晉平等伯主更迭，屬於微觀式的歷史敘述與解釋。例如僖文宣成時期，自齊桓、晉文之後，華夏諸侯漸已失去伯主，當晉靈公失伯，楚莊王更迅速崛起，中原長達三十多年沒有諸侯能與楚抗衡。陳傅良將目光置於楚莊伯業的發展：

《春秋》宣公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

《後傳》：書救陳何？楚由是始伯也。（卷7，頁12177）

《春秋》宣公九年：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後傳》：書救鄭何？楚伯也。（卷7，頁12179）

《春秋》宣公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後傳》：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予楚以伯也。（卷7，頁12179）

《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後傳》：人自為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久無伯也。（卷7，頁12180）

這四則經文分屬戰爭與盟會的主題，但《後傳》統一扣緊於楚莊伯業之下，闡發始伯之際、聖人予伯、中國無伯等觀點。

²¹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35，〈答賈端老〉，頁455。

又如襄昭定哀時期，《春秋》襄公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宋代學者討論此經文集中於大夫稱「人」之因，²²或是像孫復、劉敞、黃仲炎解釋魯襄公為何不參加邢丘之會，²³但陳傅良從「楚遂不競而晉復霸」（卷9，頁12189）的角度出發，除了也提到大夫稱人是「不以大夫敵盟主」（卷9，頁12191），更直接揭櫫：「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卷9，頁12191）明顯結合《春秋》成公十五年「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之經文，從大夫與諸侯共同序列的書法肯定晉悼公再次復伯，安定夷夏。

而「晉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卷9，頁12197），晉國從襄公二十七年宋之會後再也無法主盟稱伯，陳傅良於盟會經文中多註明這類發展：

《春秋》襄公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後傳》：晉不足以為盟主也。（卷9，頁12199）

《春秋》昭公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後傳》：晉之不自強於主盟，由重丘而後皆大夫爾。（卷10，頁12204）

²² 如胡安國曰：「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謹其始也。」張治亦云：「《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見宋·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卷21，頁347。宋·張治，《春秋集註》（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8，頁13280。

²³ 孫復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劉敞曰：「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矣而未至也。」黃仲炎曰：「公在晉而季孫宿會晉侯，蓋襄公微弱，權在季孫故也。」見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9，頁10897。宋·劉敞，《春秋劉氏傳》（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10，頁11029。宋·黃仲炎，《春秋通說》（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10，頁13179。

《春秋》昭公二十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後傳》：晉不復主盟矣。（卷10，頁12208）

晉國不振，諸侯幅裂，夷狄有機可乘，迭制天下政事，所以《春秋》昭公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想掩飾弑君之迹，遂於此年會諸侯於申。孫復認為是年乃「楚子大合諸侯于此也」，²⁴陳傅良更進一步說道：「楚初專合諸侯也。……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卷10，頁12201）、「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卷10，頁12201），楚國權勢也在此會獲得確立，之後中國無伯，華夏秩序受到嚴重威脅，以致《春秋》定公九年：「齊侯、衛侯次于五氏。」陳傅良《後傳》主張：「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卷11，頁12213）續次百年前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經文，仍以「中國無伯」為書法指歸，而多次發嘆：「昭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后越入中國」（卷11，頁12212）、「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爾矣」（卷9，頁12197），華夏儼然已淪為夷狄交爭的競技場。

沈玉成《春秋左傳學史稿》提到：「全書（《春秋後傳》）不斤斤於書例，而是重視對史實的分析、排比，例如把春秋魯國十二公分為三個時期，指出三個時期的特點，從猶知有天子到知霸而不知王，再到蠻夷之侵陵中原。」²⁵從排比史實來說，陳傅良序列事件能解決經文星散參錯所造成的閱讀侷限，²⁶亦使比事之發用有更明確的位體，達到條分

²⁴ 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頁10907。

²⁵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頁239-240。

²⁶ 張高評考察了屬辭比事的優點，其中一項就是能救經文編年之湮散。見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頁38。

件繫、經緯部別的綴敘意義。但更重要的是，不論從宏觀或微觀的取徑角度分析史事，舉凡春秋之世道升降、華夏盛衰、列國離合皆與「伯業更迭」休戚相關，陳傅良將「伯業更迭」作為《春秋》世變的解釋主體，從中推明興衰、收離、起伏、聚散之狀，內在推演亦寓含陳傅良個人的意義判斷與批評精神。

三、陳傅良「世變」視域的詮釋進路與特點

金惠敏說：「致力於文本某一方面的闡釋儘管在這一方面內部只是說明了其工作範圍或對象，但在面對文本整體並擬展開闡釋時，選擇某一方面作為入口或路徑實際上就已經是一個方法行為了。選擇某一方面即選擇一個透視角度，而透視角度眾所周知即是方法。」²⁷以「世變」詮解《春秋》並非陳傅良新創，金華學派呂祖謙、永嘉學派薛季宣早已選擇「世變」為透視角度。而呂、薛、陳三人同屬浙東學術集團，在這「共相」的視域中是否有其「殊相」？雖然「經典解讀者都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一個空白『無自性』的主體」，²⁸有歷史性的照映意義，但若是單純軌轍其迹，不能獨闢蹊徑，解釋者如何競秀於千巖、爭流於萬壑之上？

（一）「譬喻」式的興發活動

呂祖謙身為浙東地區重要的學術領袖，陳傅良曾向呂祖謙問學，兩人多有互動，²⁹他們闡釋《春秋》經傳最大的共通點是在研讀方法。呂

²⁷ 金惠敏，《後現代性與辯證解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21。

²⁸ 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臺大歷史學報》第 24 期（1999.12），頁 8。

²⁹ 《宋陳文節公傅良年譜》記載：「六年庚寅，三十四歲，東還過都城，與廣漢張公栻、東萊呂公祖謙友善，秋入太學。」陳傅良時與張栻、呂祖謙論學，「二公亦喜得友，恨見公之晚」。《呂祖謙全集》現存九封東萊先生寫給陳傅良的書信，內容多是治學的提點與勉勵，例如：「近思為學，

祖謙〈看左氏規模〉曰：「看《左傳》須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國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亂，一人之所以變遷，能如此看，則所謂『先立乎其大』者。」³⁰強調閱讀必須具備綱領式的歷史規模，鉤稽人事的升降、盛衰、治亂、變遷之本末，如同他在〈門人集錄史說〉引列子回答壺丘子看史之法，強調「觀變」的重要性，³¹這項思維正對應《春秋後傳》「詳閱世變」的特點。其次，東萊也主張讀《左傳》「須分三節看，五霸未興以前是一節，五霸迭興之際是一節，五霸既衰之後是一節」，³²亦將《左傳》三十卷畫為三節：第一卷開始到第三卷莊公九年齊桓公初起時、莊公九年到定公四年召陵之盟、召陵之盟至卷末又是一節，而「霸主迭興」則是貫串三節的支線，³³陳傅良《春秋後傳》的研讀模式正與呂祖謙雷同。³⁴

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以上引文分見清·孫藻田，《宋陳文節公傅良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11。宋·蔡幼學，〈宋故寶謨閣待制致仕贈通議大夫陳公行狀〉，載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附錄二，頁690。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卷10，〈與陳君舉〉，頁463。

³⁰ 宋·呂祖謙，《左氏傳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看左氏規模〉，頁1。

³¹ 呂祖謙〈門人集錄史說〉曰：「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為看史之法。」見宋·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卷8，〈門人集錄史說〉，頁218。

³² 宋·呂祖謙，《左氏傳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卷2，〈齊小白入于齊〉，頁14。

³³ 宋·呂祖謙，《左氏傳續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左氏傳續說綱領〉，頁2。

³⁴ 康凱淋分析呂祖謙「觀變」模式對陳傅良的影響：「（陳傅良）由春秋歷史的分合，反覆開陳霸統興衰的時勢，透過歷史敘述與解釋以紀春秋伯業興廢、強弱并吞的世運遷流，與呂東萊背後的解讀思維是一致的。換言之，止齋治經總綱『通世變』雖然淵源於史遷，但在處理《春秋》經傳的細則中，呂祖謙的影響卻更為顯著。」見康凱淋，〈陳傅良《春秋後傳》的解經方法〉，《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9期（2018.5），頁51-52。

蔣年豐曾提出一套「興的精神現象學」，落實在解釋《春秋》經傳的思維方式中，以讀者解讀經典文本的語言現象，進而表達興發活動，³⁵林維杰將蔣氏所言統攝成「譬喻」和「象徵」兩條進路：

如果歷史人物的角色是譬喻，則「譬喻」的作用乃是使讀者的關注由歷史人物過渡到詩篇的微言大義，但「象徵」則使得讀者關注在歷史人物，並從此類人物的故事敷衍中聚焦地闡揚詩篇意旨。³⁶

陳傅良關注鄭莊、齊桓、晉文、楚莊、晉悼等歷史人物，在這類伯主的「譬喻」上過渡到麟經的微言大義，所以人物行事的成敗因果並非關鍵，重點在於該如何從霸統興衰的過程探看《春秋》夷夏之辨、君臣之分。³⁷比方《春秋》中的晉悼公，陳傅良《後傳》多從經文觀察晉悼公復伯的情勢：

《春秋》襄公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後傳》：悼承厲公之烈，……而五國之大夫猶未以其眾會韓厥之師，是有待也，亦以見再伯之難也。（卷9，頁12189）

《春秋》襄公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後傳》：莊王卒，以大夫盟諸侯，納宋魚石，殺公子側、公子申、公子壬夫，楚遂不競而晉復霸。（卷9，頁12189）

³⁵ 蔣年豐，〈從「興」的精神現象論《春秋》經傳的解釋學基礎〉，《文本與實踐（一）：儒家思想的當代詮釋》（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99-149。

³⁶ 林維杰，〈象徵與譬喻：儒家經典詮釋的兩條進路〉，《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4期（2008.4），頁15。

³⁷ 《春秋後傳》曰：「《春秋》之大義：夷夏之辨、君臣之分而已。」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9，頁12193。

《春秋》襄公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後傳》：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卷9，頁12189）

《春秋》襄公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後傳》：楚數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卷9，頁12189）

聖人透過不同的經文書法表達晉悼難伯、復伯、予伯的歷史解釋，而且揭示晉悼伯業對華夏最深的影響就是大夫開始專盟，不遵諸侯之命。³⁸

但呂祖謙則著重於「象徵」，品評人物行事的心理因素、道德價值或生命精神，找出「普遍性」和「妥當性」的特點，³⁹作為《春秋》教的歷史教訓，因此他從各個層面討論晉悼稱伯的原因、影響與得失：

若論事勢，晉自襄公來，權柄浸移臣下，至靈公之弑，臣下之權漸重，到得厲公既弑之後，最是難為時節。然悼公即位之後，自朝廷至於田野，曠然大變，使復見文公之威儀綱紀。此見得悼公得要領處。……是知霸業之所以興者，一則明要約，……二則立威令，……三則布恩惠，……四則定規模，……五則舉賢才，……晉悼公之所以霸，其規模根本皆在於此。⁴⁰

³⁸ 《春秋》襄公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後傳》曰：「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為之也。」又云：「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悼公之德衰矣。」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9，頁12189、12193。

³⁹ 蔣年豐援引徐復觀述及興象與《春秋》之語：「歷史的特性，是一個人、一件事，決不會再度呈現。由此可以了解，孔子作《春秋》以為百世法，此時《春秋》中人物的言行，亦必破除其特定的時間空間與具體人物個性的限制，而把其中所蘊含的人的本質與事的基義，呈現出來，使其保有某種普遍性與妥當性。於是歷史上具體的人與事，此時亦成為此普遍性與妥當性的一種象徵。」見蔣年豐，〈從「興」的精神現象論《春秋》經傳的解釋學基礎〉，《文本與實踐（一）：儒家思想的當代詮釋》，頁122。

⁴⁰ 宋·呂祖謙，《左氏傳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

悼公天資易曉，無固必處，晉之所以霸。……以春秋時論之，似悼公資質已難得，在後世獨有漢高帝。二君皆無意、無必。當其觸物，髮上衝冠，不可止遏。及其事過，毫髮不留。此二人有過人資質。⁴¹

悼公初立，方其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固已能攬權柄，使上下知所畏，到此為之一新，固是得之大。……以悼公之霸，一時收晉國之權，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強，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悼公自以在自家粗可以辦事，止論目前，不能深憂遠慮，此是悼公大失，後不免至於六卿分晉。正如唐宦官之盛，敬宗、文宗皆不能去。⁴²

藉由晉悼述及霸業興盛的條件，也與漢高帝、唐敬宗、唐文宗相較，突顯晉悼公霸業規模與得失，這類品評方法正如李建軍所言：「呂祖謙論析歷史人物、歷史事件時，常常將情況相近或相似的人、事進行比照，然後從比照中推繹出結論。」⁴³善於以「縱橫對比」推源人事，眼光不侷限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時限，俯仰古今，稽參前後，再評論箇中治忽之道，內容較具開展與延伸。⁴⁴

卷 7，頁 84-85。

⁴¹ 同前註，頁 86。

⁴² 同前註，頁 89-90。

⁴³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頁 385。

⁴⁴ 不過我們必須注意，陳傅良《後傳》是詮解《春秋》經，呂祖謙《左氏傳說》、《左氏傳續說》針對《左傳》而發，經典文本的取材對象不一；而且呂祖謙完全將《左傳》視作史書性質，謂史有二體，《左傳》是編年體之始，又謂：「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書皆當精熟細看，反覆考究直不可一字草草。」將《左傳》和《史》、《漢》並列，談到觀史之方，純然以史學為研究取向，興發活動勢必隨著開啟門徑而有深淺廣狹的差異。參見宋·呂祖謙，《麗澤論說集錄》，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卷 8，〈門人集錄史說〉，頁 218。宋·呂祖謙，《左氏傳續說》，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左氏傳續說綱領〉，頁 1。

(二) 以「世變」裁擇《春秋》的語言現象

回到永嘉學派內部的學術系統，薛季宣是「《春秋》世變」重要的奠基者，今人黃覺弘曾結合薛季宣〈春秋經解自序〉、葉適〈溫州新修學記〉等文章，歸納薛季宣解經大要，其中就提到：「薛季宣『通世變』的解經宗旨，奠定了永嘉學派《春秋》學之基礎，至其弟子陳傅良遂發揚光大。」⁴⁵點明薛季宣、陳傅良二者學術承變的關係。我們查看現今薛氏所存著作內容，⁴⁶的確能看到「世變」之語，⁴⁷也會發現對「伯業更迭」的關注：

《春秋》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經解》：城濮之役，鄭無楚患者十有五歲，待伐而後救之晚矣，于以見中國之無賢方伯也。⁴⁸

《春秋》文公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經解》：書楚子使椒何？無賢方伯，荆蠻稍知用夏，駸駸乎列大國之上。⁴⁹

華夏未見霸主，楚國遂有機會竄升，騷虐中原，陳傅良《後傳》亦曰：「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卷6，頁12171），察看視角與薛季宣相同。

⁴⁵ 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頁257。

⁴⁶ 薛季宣《春秋經解》、《春秋經解指要》雖佚，但在他文集中還保有〈春秋經解自序〉一文，再加上今人黃覺弘輯考薛季宣經說佚文一百七十二條，有助於我們掌握薛氏《春秋》學的梗概。見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頁250-255。

⁴⁷ 例如《春秋》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薛季宣曰：「盟逮于戎，世變之甚。」見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頁42-43。

⁴⁸ 同前註，卷15，頁387。

⁴⁹ 同前註，頁388。

其次，薛季宣也採取連綴比事，推演《春秋》世變，例如《春秋》哀公六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薛氏曰：

昭十二年，楚人伐徐之歲，楚虔方熾，而書晉伐鮮虞。十五年，楚寇少安，不能輯睦中夏，而荀吳伐之。定四年，召陵罷會，楚有可乘之機，而士鞅及衛孔圉伐鮮虞。五年，吳方入郢，士鞅又伐鮮虞，於是盡失諸侯，又有趙鞅之伐，則晉霸業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⁵⁰

總計統合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定公四年「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五年「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哀公五年「晉趙鞅帥師伐鮮虞」等五則經文，縱越四十年間晉國克制鮮虞的歷程，歸納卿士陪臣坐自封殖、聚斂貪貨，導致晉昭公、晉頃公、晉定公霸業衰替；而陳傅良更進一步賅括成襄時期，晉國連年討伐鮮虞、白狄、赤狄，端見「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卷10，頁12203），亦可補證薛氏所言。

不過更重要的是，雖然薛季宣也採取比事推演、通貫經文的解經方法，卻會著眼於「典制事務」，這是陳傅良《春秋後傳》缺少的切入角度。比方魯莊公在位之際，薛季宣就從築城等禮度一事批評莊公：

莊公六年後，無麥苗、大無麥禾、螟麋蜚相繼而有，大水者三，中君尚當少警，而公之軍旅盟會未嘗休息，至於侈心一起，因娶而觀社，丹楹刻桷；告糴之時築鄙，次年新廐城諸、防，去年三築臺而不雨，今又城小穀，平歲猶不可，況饑而輕用民力乎？⁵¹

鉤稽莊公六年到三十二年的經文，會通連串的解讀模式也落實在陳傅良《春秋後傳》，只是陳傅良目光集中於王命不行、齊桓圖伯，較不關注魯莊公築城等事宜，但薛季宣則會聚焦在「典制事務」，這應合「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的治學綱領。⁵²呂祖謙就肯定薛季宣「於

⁵⁰ 同前註，卷 29，頁 732。

⁵¹ 同前註，卷 9，頁 237。

⁵²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

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曾下過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⁵³陳傅良亦強調薛氏「尤邃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⁵⁴具備「實用」治世的指導方針。⁵⁵當然，陳傅良也關注制度考證，只是研究《春秋》經傳選擇扣緊「伯業更迭」，以印證制度紀綱隳壞的後果，⁵⁶寓有另外的側重和目的，這也是薛、陳二人發揮「《春秋》世變」的差異之一。

第二，雖然薛季宣、陳傅良闡釋「《春秋》世變」皆屬於譬喻式的興發活動，但陳傅良有意積極調和「世變」與「屬辭」，揭櫫經文筆削背後的去取用意，使「世變」更能貼合麟經語境，而基於書法的「世變」又可形成縝密有據的命題。例如前文列舉《春秋》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薛、陳二人詮解如下：

《經解》：城濮之役，鄭無楚患者十有五歲，待伐而後救之晚矣，于以見中國之無賢方伯也。⁵⁷

《後傳》：兵將嘗書大夫，此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也，曷為貶稱人？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卷6，頁12171）

同樣梳理出「伯業更迭」的世變歷程，陳傅良則進一步納入大夫稱「人」的褒貶義法，有別於薛季宣的觀察模式。又如《春秋》文公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後傳》亦曰：「垂隴嘗書士穀而

（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52，〈艮齋學案〉，頁1690。

⁵³ 宋·呂祖謙，《東萊呂太史別集》，載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卷7，〈與朱侍講書〉，頁412。

⁵⁴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51，〈右奉議郎新權發遣常州薛公行狀〉，頁644。

⁵⁵ 樓鑰評價：「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惟薛氏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見宋·樓鑰，《攻媿集》，卷95，〈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頁1323。

⁵⁶ 康凱淋提到：「如果《周禮》是制度面的理論，那麼《春秋》中君道從『無王』到『無伯』的興衰沿革則是事例的最佳印證：一旦三綱隳壞、君道淪喪，最終會走入夷狄爭勢的局面。」見康凱淋，〈陳傅良《春秋後傳》的解經方法〉，《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9期（2018.5），頁62。

⁵⁷ 元·汪克寬，《春秋胡傳附錄纂疏》，卷15，頁387。

序諸侯，此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也，則何以不序？晉始失伯也。」（卷6，頁12170）將經文不序列所會諸侯之書法，導向晉靈公失伯不競。《春秋》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陳傅良認為聖人書「次」是「楚之欲圖伯而未集」（卷6，頁12170），亦以「伯業更迭」為經文書法之歸趨，一再顯示將「世變」織聯到經典文本中的語言現象，⁵⁸和其他學者先從經文自身的敘事語言歸納內在指涉的方法截然不同。⁵⁹

⁵⁸ 因此經文中任何字詞都可作為世變的註解，例如《春秋》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陳傅良從「以」字抉發伯業始興：「伐未有言以者，則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書以，此伯之所由興也。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以者，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又如《春秋》文公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陳傅良曰：「此其言遂何？齊始敗夏盟也。晉文公卒，襄公能合諸侯；靈雖不競，而新城之盟諸夏汲汲焉固結之，則猶有屬也。而齊獨為亂階，執天子之使，加兵於魯，於是伐曹，晉遂不競而諸侯貳，故悉書之也。」兵事書「遂」必關乎天下，「遂」字意指齊國生事，破壞華夏團結，導致晉靈公無法內合諸侯、外抗夷狄。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2，頁12136；卷6，頁12174。

⁵⁹ 以《春秋》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經文為例，南宋呂大圭《春秋或問》發義：「楚子、蔡侯之次，何也？曰：《春秋》伐而書次者，若齊率諸侯以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如齊師次于聶北救邢是也。師而書次者，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會伐而書次者，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是也。凡書次者必有兵，楚子、蔡侯之次于厥貉，蓋亦兵次也明矣。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蓋楚自城濮之後不敢萌心以窺中國，襄公沒、靈公幼而後楚有伐鄭之舉、聘魯之事，然則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者，正其窺中國之始也。」先結合和「次」相關之經文：伐而書次、救而書次、師而書次、會伐而書次等，認定書「次」必出兵，再延伸至「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正其窺中國之始」的歷史解釋，明顯先樺接語言現象，再揭發興發活動。見宋·呂大圭：《春秋或問》（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卷14，頁13458。

四、路線之爭：朱熹對陳傅良「《春秋》世變」的批評

前文已說明「世變」是永嘉學派的治學宗旨與核心精神，他們將「世變」融貫於《春秋》經解，箇中的運用模式並未間斷，彷彿作為一項通則，彼此依存與傳衍。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人事發展極其複雜，交相離合、張弛、絕續與代興，在這世變推移的歷程中，永嘉學者選擇「伯業」為歷史脈理，眼光扣緊諸侯初伯、失伯、復伯、無伯等興衰，如陳傅良在〈答賈端老四〉信中所言：「《春秋》固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案。」⁶⁰止齋弟子曹叔遠（1159-1234）於南宋紹熙二年（1191）向朱熹問學時，⁶¹也述及他跟隨陳傅良研治《春秋》學的重點：「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伯者與奪之義。」⁶²不斷顯現「《春秋》世變／伯業」是永嘉學派重要的經典解釋。

然而經典解釋並非封閉獨立地存在於文本之中，它是一個歷史的存在，在同個時代可能會造成廣泛的影響。李弘祺說：「思想如果放在更大的範圍加以觀察，把思想看做是人對他本身環境的認識和意識上的反應的話，那麼我們應該能因此看出歷史現象如何塑造了個人的思想，以及思想如何決定人面對其環境。」⁶³永嘉學派並非南宋唯一的學術社群，他們處在緊密的學術網絡當中，和各家的交會都具有政治、社會、學術等複雜的因素，若將目光轉向其他學術社群，就可看到各家對經典文本有不同的創造與制約，例如攻擊浙學甚烈的朱熹：

⁶⁰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35，〈答賈端老四〉，頁456。

⁶¹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卷下，頁1204。

⁶²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載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120，頁3785。以下援引朱熹著作皆此版本，不另一一作註。

⁶³ 李弘祺，〈試論思想史的歷史研究〉，載韋政通編，《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臺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7），頁242。

《春秋》之作，不為晉國伯業之盛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伯；內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⁶⁴

今之治《春秋》者，都只將許多權謀變詐為說，氣象局促，不識聖人之意，不論王道之得失，而言伯業之盛衰，失其旨遠矣！⁶⁵

看已前《春秋》文字雖摘，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止說得霸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⁶⁶

呂祖謙身為孝宗乾道、淳熙年間重要的學術領袖，⁶⁷在浙學間的影響甚大，他透過「史學」的角度詮解《左傳》，有鮮明的史學色彩，⁶⁸但朱熹多次表達質疑或不滿之語：「呂伯恭愛教人看《左傳》，某謂不如教人看《論》、《孟》」⁶⁹、「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⁷⁰更多次批評左氏乃「猾頭熟事、趨炎附勢之人」、「是一個審利害之幾，善避就底人」、「見識甚卑」，⁷¹《左傳》一書「皆功利之說」，⁷²所以

⁶⁴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67。

⁶⁵ 同前註。

⁶⁶ 同前註。

⁶⁷ 田浩就認為：「從 12 世紀 60 年代末期到 1181 年他（呂祖謙）去世十幾年裡，他其實是道學最重要的領袖。」見美·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頁 82。

⁶⁸ 學界皆已評斷呂祖謙《左傳》學有此特點，例如趙伯雄說：「呂祖謙正是把《左傳》看做是史書的。……他不是糾纏於書法、義例之中，而是著眼於歷史發展的大勢，從歷史事實中去發掘、頓悟，進而闡釋義理。」戴維《春秋學史》亦稱：「呂祖謙這種讀《左傳》的整體把握方法，與那些局於義例者大異其趣，有將《左傳》作為史鑑來讀的傾向。」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也說：「呂祖謙習治《左傳》，不管是其閱讀、品評《左傳》時採用的觀史、論史的視角，還是其考索、研究《左傳》時採用的考史、鑑史的維度，都體現出一種鮮明的史學取向。」各家在這方面取得一定的共識。見趙伯雄，《春秋學史》，頁 551。戴維，《春秋學史》，頁 378。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頁 394。

⁶⁹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38。

⁷⁰ 同前註，卷 104，頁 3433。

⁷¹ 同前註，卷 83，頁 2838-2839。

⁷² 同前註，頁 2840。

朱熹基於義利的角度，反對伯業盛衰的討論，⁷³明顯是針對以呂祖謙為首的浙學集團而發。

再者，朱熹又曾訓示門人：

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直見得透，卻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終做事不得。比見浙間朋友，或自謂能通《左傳》，或自謂能通《史記》；將孔子置在一壁，卻將左氏司馬遷駁雜之文鑽研推尊，謂這箇是盛衰之由，這箇是成敗之端。反而思之，干你身己甚事？你身己有底事合當理會，有底病未曾去，卻來說甚盛衰興亡治亂，這箇真是自欺！⁷⁴

他非常強調道德的自我修養，文中「明辨為己為人之別」實際上就是「仁義禮智」的具體落實，⁷⁵主張治學須先抓住本原，先正路頭，自有辦法周遍群書，這套本源就是存於《論》、《孟》之中：「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⁷⁶浙學推許《左傳》、《史記》根本是顛倒治學途徑。所以當曹器遠原本好讀伊洛諸書，但求教陳傅良

⁷³ 劉德明分析：「在朱子以義利判定王霸的標準下，不論是齊桓公或是晉文公，都是出於功利的私心，因此齊、晉的所有過程與成就在『不義』的標準下，都變得無足深論，故言：『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大約也因為如此，朱子認為若不能深切掌握以『利／義』做為核心價值分判標準，反而用心在探索齊桓、晉文何以能完成霸業的詮釋方向都是錯誤的。」見劉德明，〈「王霸之辨」在《春秋》解經中的運用與反省——以朱熹及張洽的觀點為核心〉，《中正漢學研究》第27期（2016.6），頁125。

⁷⁴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4，頁3612-3613。

⁷⁵ 朱熹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只趨著腳指頭便是。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若看得道理透，方見得每日所看經書，無一句一字一點一畫不是道理之流行；見天下事無大無小，無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發見。」見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載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卷121，頁3836-3837。

⁷⁶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5，〈答呂伯恭〉，頁1532。

之後，別有新悟，認為單純理會「道理」易流於空虛之弊，⁷⁷朱熹對此深感不安：「向見伯恭亦有此意，卻以《語》、《孟》為虛著。《語》、《孟》開陳許多大本原，多少的實可行，反以為恐流於空虛，卻把《左傳》做實，要人看。殊不知少間自都無主張，只見許多神頭鬼面，一場沒理會，此乃是大不實也！」⁷⁸門人問《左傳》疑義，朱熹也直斥：「公不求之於《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縱有，能幾何？所謂『棄卻甜桃樹，緣山摘醋梨』！天之所賦於我者，如光明寶藏，不會收得；卻上他人門教化一兩錢，豈不哀哉！」⁷⁹因此朱熹反對《春秋》、《左傳》伯業盛衰的討論，背後動機實際是矯正時人治學次第的錯亂。

不過，我們也必須注意，朱熹並未反對「世變」，他曾就陰陽之氣的運行規律歸納人類歷史：「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⁸⁰以讀《左傳》「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⁸¹並認為：「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⁸²體察歷史因革仍以「事勢之變」為原則。⁸³但讓朱熹不滿的是，陳傅良在歷史世變中獨以五霸為據案，將聖人與奪的標準建立於《春秋》伯業的得失，明顯失去證立道德教訓的目的，偏離了儒家道德學，完全失去「道德判斷」與「普遍理則」，⁸⁴最後的經解盡流於「功

⁷⁷ 曹器遠言：「少時好讀伊洛諸書。後來見陳先生，卻說只就事上理會，較著實，若只管去理會道理，少間恐流於空虛。」見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載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卷 120，頁 3785。

⁷⁸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0，頁 3785。

⁷⁹ 同前註，卷 121，頁 3836。

⁸⁰ 宋·朱熹，《孟子集注》，卷 6，頁 330。

⁸¹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37。

⁸² 同前註，卷 66，頁 2185。

⁸³ 許松源就主張：「（朱熹）認為『世變』乃是理解《春秋》經義的基礎，《春秋》之旨與其褒貶之義，只有置於『世變』的脈絡當中才能凸顯其所關注的特定問題，以及經解上可行的取徑。」見許松源，《經義與史論——王夫之《春秋》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 145。

⁸⁴ 黃俊傑分析儒家論述中，具體的歷史事實和抽象的普遍理則是相互結合滲

利」之語：「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⁸⁵、「浙間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⁸⁶、「今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⁸⁷。

另外，學界已點出朱熹「先經後史」的觀點，錢穆就說：「朱子教人為學，先經後史，亦承襲二程教法。……其主治經而必及於史，則是朱子獨有精神也。」⁸⁸《朱子語類》也有非常多的內容可證，和永嘉學者向來被視為「經史並重」的治學特點確實不同。但若更聚焦來看，經、史典籍的切入失當屬於外緣方法，內在理路失於博雜而不能返約亦是一大問題。朱熹屢次批評呂祖謙：「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⁸⁹「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閩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⁹⁰而《朱子語類》記載一則朱熹與其弟子滕璘（1150-1229）討論陳傅良治《春秋》的對話：

問：「《春秋》如何說？」滕云：「君舉云：『世人疑左丘明好惡不與聖人同，謂其所載事多與經異，此則有說。且如晉先蔑奔，人但謂先蔑奔秦耳。此乃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是何言語！先蔑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且書『奔秦』，謂之『示貶』；不書奔，則此事自不見，何以為褒？昨說與吾友，所謂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乃謂此耳。是乃於穿鑿上益加穿鑿，疑誤後學。」⁹¹

透的，而且從歷史敘述之目的而言，儒家歷史學是一種道德學和政治學，所以歷史敘述不僅是證明道德教訓的方法，也正是在建構儒家道德學，從歷史人物的行為證立抽象普遍的哲學或道德命題。見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127-144。

⁸⁵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3，頁3873。

⁸⁶ 同前註，卷94，頁3168。

⁸⁷ 同前註，卷83，頁2857。

⁸⁸ 錢穆，〈朱子之史學〉，《朱子新學案》，載錢穆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全集》冊1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頁121-122。

⁸⁹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2，頁3850。

⁹⁰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1，〈與張敬夫〉，頁1334。

⁹¹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3，頁3863-3864。

朱熹向來否定《春秋》一字褒貶，⁹²當然不會認同陳傅良謂經文書「奔」示貶，再者，學問必須「自博而反諸約」、⁹³「雖說是博，然求來求去，終歸於一理」，⁹⁴若道理能參透，則經書的每字每句都是道理的流行，天下事一名一件也都是道理之發見，⁹⁵陳傅良治學都是「專於博上求之，不反於約」帶來的負面影響，若要避免穿鑿上益加穿鑿，讀《春秋》必得先反諸約、掌握理：

問讀《春秋》之法。曰：「無它法，只是據經所書之事迹，準折之以先王之道，某是某非，某人是底猶有未是處，不是底又有彼善於此處，自將道理折衷便見。如看《史記》，秦之所以失如何？漢之所以得如何？楚漢交爭，楚何以亡？漢何以興？其所以為是非得失成敗盛衰者何故？只將自家平日講明底道理去折衷看，便見。看《春秋》亦如此。⁹⁶

問：「今欲看《春秋》，且將胡文定說為正，如何？」曰：「便是他亦有太過處。……今理會得一箇義理後，將他事來處置，合於義理者為是，不合於義理者為非。亦有喚做是而未盡善者，亦有謂之不是而彼善於此者。且如讀《史記》，便見得秦之所以亡，漢之所以興；及至後來劉、項事，又知劉之所以得，項之所以失，不難判斷。只是《春秋》卻精細，也都不說破，教後人自將義理去折衷。」⁹⁷

⁹² 張高評總結朱熹對《春秋》義例的觀點：「朱子以為：《春秋》中爵位之予奪，功罪之賞罰，一切出於直書其事，『孔子也予奪他不得』，故反對義例褒貶之說。」見張高評，〈朱熹之《春秋》觀——據實直書與朱子之徵實精神〉，載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主編，《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389。

⁹³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8，頁3512。

⁹⁴ 同前註，卷36，頁1340。

⁹⁵ 同前註，卷121，頁3836-3837。

⁹⁶ 同前註，卷55，頁1318。

⁹⁷ 同前註，卷83，頁2841-2842。

張元德問《春秋》疑難，朱熹亦建議「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遍通矣」，⁹⁸這是他秉持的治學精神與方法，所以朱熹雖對胡安國《春秋傳》有所不滿，⁹⁹但仍肯定他建立在「義理」之上的經解；¹⁰⁰相對之下，對「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¹⁰¹「（左氏）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的特色則無法認同。¹⁰²

朱熹「義理」的內涵是與「天理」有關，高舉天理的普遍性，並將三綱統攝於天理的範疇，由博返約的歷程最終是要貴約，進而守約施博、以一馭萬。湯勤福分析：「（朱熹）他認為讀《春秋》、《尚書》這類經過聖人之手者，就須理解其中蘊含著的天理；讀《左傳》、《史記》之類史書，則需辨別何者違背天理，何者符合天理。」¹⁰³這套路數正與永嘉學派完全對立。

陳傅良曾著《左氏章指》三十卷，與呂祖謙一樣，高度推許《左傳》：

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之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¹⁰⁴

⁹⁸ 同前註，頁 2836。

⁹⁹ 《朱子語類》記載：「問：『《春秋》，胡文定之說如何？』曰：『尋常亦不滿於胡說。』」見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47。

¹⁰⁰ 朱熹曰：「胡文定義理正當」、「胡《春秋》大義正」、「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見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40、頁 2845、頁 2834。

¹⁰¹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838。

¹⁰² 同前註。

¹⁰³ 湯勤福，《朱熹的史學思想》（濟南：齊魯書社，2000），頁 118。

¹⁰⁴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40，〈徐得之《左氏國紀》序〉，頁 510。

不能單從編年體的體例評論《左傳》，因為《左傳》採輯諸侯史記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依經為傳，¹⁰⁵讀者可經由《左傳》保存《春秋》不書的內容，推尋麟經書法用意。¹⁰⁶樓鑰肯定陳傅良《左傳》研究的成績：「博極群書，而于《春秋左氏》尤究極聖人制作之本意、左氏翼經之深旨。」¹⁰⁷又言：「若左氏或以為非為經而作，惟公以為著其不書以見《春秋》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力。《章旨》一書，首尾專發此意。」¹⁰⁸《左氏章旨》就是落實這套解經方法，「於《左氏》以其所書證其不書，庶幾善求筆削之旨」。¹⁰⁹

陳傅良對《史記》的評價亦甚高，深嘆此書湮沒無聞：「太史公書又以接《尚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¹¹⁰「蓋其融液九流，萃為一篇，罷黜雜論，自〈五帝紀〉以下，盛有依據。……惜自班固看渠不過，妄有瑕摘，後生訟習，遂成牢談。千五百年之間，此書湮晦」，¹¹¹指導賈端老應將《左傳》、《史記》並讀，共講其旨；又曾提醒高文虎（1134-？）注解《史記》「若能為發大意，不必若諸家鉅訂訓釋，亦千載美事」，¹¹²與朱熹認為「《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卻顛了」的接受態度截然不同。¹¹³

¹⁰⁵ 陳傅良曰：「蓋《左氏》本依經為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剝經誼，而非自為書。」見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6，〈答薛子長〉，頁 468。

¹⁰⁶ 陳傅良曰：「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以表見其所書。」見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5，〈答賈端老〉，頁 455。

¹⁰⁷ 宋·樓鑰，《攻媿集》，卷 95，〈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頁 1328。

¹⁰⁸ 同前註，卷 51，〈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序〉，頁 699。

¹⁰⁹ 元·趙汭，《春秋左氏傳補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左氏傳補注序〉，頁 14973。

¹¹⁰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5，〈答賈端老〉，頁 456。

¹¹¹ 同前註，卷 35，〈答賈端老〉，頁 456。

¹¹² 同前註，卷 37，〈與高炳如監丞〉，頁 475。

¹¹³ 宋·朱熹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9，頁 4316。

另外，我們雖已無法得知《春秋後傳》確切的著作時間，但從止齋〈答張端士第二書〉可看到他晚年病榻前註解的辛勞：「某病軀日衰弱，漸漸了得《春秋》一書，及未啟手足之前，更加刪潤。則自有《春秋》來，未有此書，可籍手見古人無作。」〈答張端士第四書〉亦記：「某近復苦泄瀉，今幸稍愈。以年例論之，如此浸久，是結裹之證也。萬事已置勿論，惟《春秋後傳》垂成，尚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¹¹⁴而且據門人周勉所述，《後傳》是止齋生前未竟之作，學生在他過世以後才整理完成，¹¹⁵可見陳傅良晚年註解《春秋》，心力盡傾於《春秋後傳》之上。

自南宋紹熙二年（1191）朱熹開始與陳傅良論學，也和陳傅良之弟子曹叔遠辯論儒學理論及工夫，紹熙五年（1194）朱、陳發生廟制之爭，慶元年間朱熹又駁斥陳傅良《周禮說》一書，兩方的學術觀點始終分歧。¹¹⁶朱熹在慶元六年（1200）去世，陳傅良兩年後也相繼離世，如果《春秋後傳》作於慶元六年（1200）到嘉泰二年（1202）之間，那麼將「世變／伯業」融貫於麟經並非單純地形式答辯，也不是被動地接受朱熹《春秋》學的迎戰，而是永嘉學者主動對抗朱學帶來的批評，是書寓有捍衛自身價值的堅定，以及延續學術命脈的決心。換言之，「《春秋》世變／伯業」是一個解釋載體，但在同時代的解釋平台上卻會形塑成不同的弧度曲面，它不只是單方面解釋文本經義的歧異，而是涉及學派的學術風氣、方法、宗旨，甚至是追求的真理旨歸與文化使命。

¹¹⁴ 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卷 38，〈答張端士第四書〉，頁 488。

¹¹⁵ 周勉（-1208-）曰：「先生為《後傳》，將脫稿而病，期歲而病革，學者有欲速得其書，俾傭書傳寫，其已削者或留其貼於編，增入是正者或揭去弗存也。勉宦江陵還，始得朋友訂正之，然已削者可刊，貼於編而增入是正者不可復求矣。」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頁 12122。

¹¹⁶ 關於陳、朱二人的分歧，以及兩方的動機、立場，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第五章〈永嘉學派的崛起和朱熹的批判〉有詳細討論，可參看。見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頁 210-249。

五、結語

美國著名的歷史哲學家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在他的著作《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中提到：「一部歷史理應有某種解釋性成分，就像地圖有『圖例』。然而，這種成分必須移到敘事自身的外圍，也和地圖的圖例一樣。」¹¹⁷倘若以此比喻：聖人的《春秋》是一張地圖，後代的闡釋是依照既有地圖，詳盡地探看區域之外，更要從中表達地圖的世界觀。如果能客觀地按照地圖而行，那麼實體地區大抵能符合地圖所繪；一旦對地圖的解讀失當，必然強加不少虛擬區域而產生錯誤的世界觀。唯《春秋》這幅地圖缺少圖例，因此歷來讀者積極編入各種標誌、法則或符號，試圖打破神秘未知的想像空間。南宋永嘉學派以「觀世變」為解讀方法，陳傅良《春秋後傳》有充分的證據說明這項特點，而《春秋》的繪製圖例則是「伯業迭興」，將霸統興衰當成構成要素，建立夷夏之辨、君臣之分的世界觀。閱讀方法與繪製圖例密不可分，也就是先決定了「世變」的絕對視域，才繪製「伯業」的指引內件，在春秋時勢不斷遞變的洪流中，測量王霸存滅的比例深淺，還原製圖者最初的發明。不過因為地圖無法自明世界觀，因此讀者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形塑不同的圖景，但開放性的詮釋很容易造成認知散離的狀況。換句話說，彼此對地圖圖例已各有預設的前見，可能會因政治權勢或學術高度主導話語發言，造成針鋒相對的溷亂。若對應到閱讀與詮釋經典，人們往往受到生活經驗限制，有意無意地影響詮說，或是牽制於當代的政治環境、學術氛圍、師法家學等因素，干擾思想的互動交流，導致理路分野、殊趣紛紜，難見合流匯通，閩南朱熹、浙東陳傅良之爭就是鮮明的歷史例證。

¹¹⁷ 美·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著，陳新譯，《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頁170。

主要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孫復，《春秋尊王發微》。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通志堂經解》本。
- 〔宋〕劉敞，《春秋劉氏傳》。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通志堂經解》本。
- 〔宋〕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 〔宋〕呂祖謙撰，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 〔宋〕陳傅良撰，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
-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通志堂經解》本。
- 〔宋〕朱熹著，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宋〕張洽，《春秋集註》。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
- 〔宋〕黃仲炎，《春秋通說》。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
《通志堂經解》本。
- 〔宋〕葉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宋〕樓鑰，《攻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本。

- 〔宋〕戴溪，《春秋講義》。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88，《叢書集成續編》本。
- 〔宋〕呂大圭，《春秋或問》。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
- 〔宋〕不著編人，《十先生輿論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元〕黃潛，《黃文獻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本。
- 〔元〕趙汭，《春秋左氏傳補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通志堂經解》本。
- 〔明〕王禕，《王忠文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本。
-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
-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孫藻田，《宋陳文節公傅良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 王宇，《道行天地：南宋浙東學派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
-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 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撰，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2005。
- 李劍鳴，《歷史學家的修養和技藝》。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 陳安金、王宇，《永嘉學派與溫州區域文化崛起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金惠敏，《後現代性與辯證解釋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 段渝主編，《劉咸炘論史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8。
- 陸敏珍，《宋代永嘉學派的建構》。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3。
- 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
- 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
- 康凱淋，《胡安國《春秋傳》研究》。臺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4。
-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2016。
- 湯勤福，《朱熹的史學思想》。濟南：齊魯書社，2000。
-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 蔣年豐，《文本與實踐（一）：儒家思想的當代詮釋》。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0。
- 錢穆著，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5。

（二）期刊論文

- 林維杰，〈象徵與譬喻：儒家經典詮釋的兩條進路〉，《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34期（2008.4），頁1-32。
- 黃俊傑，〈從儒家經典詮釋史觀點論解經者的「歷史性」及其相關問題〉，《臺大歷史學報》第24期（1999.12），頁1-28。
- 陳安金，〈從對立到整合：永嘉學派研究的基本路向〉，《哲學動態》第5期（2004），頁45-49。

劉德明，〈「王霸之辨」在《春秋》解經中的運用與反省——以朱熹及張洽的觀點為核心〉，《中正漢學研究》第27期（2016.6），頁117-142。

戴景賢，〈論宋代經史學發展之類型、樣態、取徑、議題與其所形成之特殊之文獻之學〉，《文與哲》第28期（2016.6），頁83-152。

（三）會議論文

張高評，〈朱熹之《春秋》觀——據實直書與朱子之徵實精神〉，載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經學研究會主編，《第八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353-390。

（四）學位論文

許松源，《經義與史論——王夫之《春秋》學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Selected Bibliography

- Hu, An-guo (Author), Chian, Wei-chiang (Editor). The Hu's Commentary o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Hangchow: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ress ,2010.
- Sun, Fu. Chun qiu zun wang fa wai, Tongzhitang's Elucidation of Classics. Taipei: Han J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85.
- Zhang, Qia. Chun qiu ji zhu. Tongzhitang's Elucidation of Classics. Taipei: Han J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1985.
- Huang, Zhong-yan. Chun qiu tong shuo. Tongzhitang's Elucidation of Classics. Taipei: Han J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1985.
- Liu, Chang. Chun qiu liu shi zhuan. Tongzhitang's Elucidation of Classics. Taipei: Han J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1985.
- Zhao, Fang. Chun qiu zuo zhuan bu zhu. Tongzhitang's Elucidation of Classics. Taipei: Han Ji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1985.
- Gu, Dong-gao. Chun qiu da shi biao.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3.
- Kang, Kai-lin. A Study on Hu Anguo's Chunqiu Zhuan. Taipei: Zhizhi Xueshu Press,2014.
- Zhao, Bo-xiong. Chunqiu Xue Shi .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2004.
- Huang, Zong-xi(Author); Quan, Zu-wang (Remarked). Song Ruan Xue 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6.

Yongjia School and “Shi Bian” in “Chun Qiu” —“Chun Qiu Hou Zhuan” by Chen Fuliang as Case Study

Kai-Lin Kang*

Abstract

Taking “Chun Qiu Hou Zhuan” (means sequel to “Chun Qiu”) written by Chen Fuliang for example, the study analyzed the topics relevant to Yongjia School and “Shi Bian” (means transition of dynasties) in “Chun Qiu”, such as the content and features of argument about “Chun Qiu” by Yongjia School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ongjia School and other schools. Just as the opinions of other scholars, Chen Fuliang treats “Shi Bian” in “Chun Qiu” as the basis and the only guide of implications in “Chun Qiu” and pays attention on constructing the context of rise and fall of leadership and legitimacy. He accordingly interpreted scriptures, consciously connected “Shi Bian” to every language phenomenon and contributed it to the implications within the scriptures. Zhu Xi reject the discussion on transition of leadership and legitimacy in “Chun Qiu” and “Zuo Zhuan” by Zhu Dong School: on the one hand, he thought the methods to interpret scriptures are inappropriat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nal logics lack theoretical parsimony. The addition of “Shi Bian/leadership and legitimacy” to “Chun Qiu Hou Zhuan” by Chen Fuliang not only is a formal reply but also aims to resist the criticism from the Zhu School. The book contains insistence to defend its values and determination to continue its academic legacy.

Keywords: Chen Ful-iang, Yongjia School, Chun Qiu, Zuo Zhuan, Zhu Xi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